

# 导 言

伯顿·克拉克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比 25 年前提高了。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已呈几何级数增加，在行进中的知识前面奔驰。这种令人困惑的差距有许多来源。在近代社会的许多有组织的部门，各项任务急剧增加，各种职责日益模糊。许多观察家和分析家都惊异地谈论到事务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确定。在高等教育的内部，学术研究的紧迫号令，在旧的知识领域内部迅猛地创造出新的知识领域和神秘的学术专业，使国际学术中心的许多名牌大学和学院的基础不断分化，然后向下扩散到自己国家的其他大学和学院，向外扩散到其他国家。仅仅基于这些原因，如果我们要领会学者们在做些什么，每年就有很多东西要了解。近代高等教育规模的迅猛扩张，更增加了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高等教育规模和范围的变化，以学生和教授人数的增长为标准，反映在行政梯队的层层叠加上，上层的人和下层的人、内部的人和外部的人越来越感到彼此没有联系。同时，很多人增强了了解和控制高等教育的雄心壮志。公民、官员和实际工作者都怀着日益高涨的期望，认为我们应该能安排教育事务，控制教育改革。分析家们深信，他们应该找出答案，并且认为如果他们加倍努力，设

计正确的理论，将能做到这一点。在使我们迷惘的模糊之中应该发现简明的线索。而同时，差距又在扩大。

怎么办？没有方法减少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因为任何个人无法控制经验的世界。在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各国之间，科学和高等教育内部在发明、专门化和竞争等方面出现的出乎意料的事，就足以保证将来不会更加简单。从分析的方面看，研究工作者不大可能积聚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极大地加速他们的进展和拓宽他们的研究范围，从而弥合差距。像在别处一样，他们命途多舛。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选择地进行研究，并压低他们的期望。我们从来没有真正需要了解高等教育的一切，那些想全部弄清近代高等教育系统的人们，是想做不可能的事，把注意力推向错误的方向。战略的决策是要有所选择，更加有意识地区分重要的和琐细的。

在有选择地探索高等教育的复杂现实的过程中，在当前，求助于若干最有关系的学科和它们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大好处。多种不同的分析的专业便是一些可供选择的认识方法，是使分析家更有知识同时又更加无知的视力通道。一个有启发作用的观点就像戏院里的聚光灯，当用强烈光线照射舞台前方的某些部位时，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部位上，同时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边缘的地位。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就像所有灯光都照射在舞台上，人们的目光在整个舞台前后漫游。但是学科的观点是非用不可的，因为我们正是在专家所发展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力量中找到利刃。高等教育的研究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手边没

有进行这种研究的各种不同的分析观点，没有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组织理论等所提供的观察的方法，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们。

随着过去 20 年间高等教育研究的加速发展，我们确实看到了许多学科的专家们的研究工作。社会学家们对高校入学机会和质量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经济学家们致力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大学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政策分析家们已经离析出决策的主要领域，既研究政策的制订，又研究政策的实施。历史学家们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事件的川流不息和过去怎样制约着现在。当专家们研究这些问题时，很自然他们只管自己的事，不同学科的奖赏保证学术活动将沿着不同的轨道奋进。专家们有各种不同的词汇，难以了解彼此的语言。当 he 或她正专心致志研究本门学科时，谁能理解计量经济学家呢？学科专家们占领不同的文化机构，在不同的刊物发表文章，参加不同的会议，属于不同的学术团体。同时，因为他们谈论很不相同的东西，各自有一定的自信心，他们既迷惑实际工作者和外行人，也互不了解。

因此，当学科专家们研究高等教育时，我们可以跟随他们，要求他们解释他们的聚光灯所揭露的东西，并给他们相互介绍，这是有意义的事。偶尔的集体研究也可能是很有效益的。这种努力可以加强一种意识，就是那些分裂知识的人有责任把知识整合起来。它们可以通过其他领域的专家的坚持在树丛中多看一下森林，并且帮助各个领域的专家开阔思想。它们可以提供同声翻译，把专家的行话变为共同分享的语言。它们还能通过任何一种门类家，更

多地了解相邻专业的专家们的研究成果而丰富本专业的内容。在集体研究中，个人见解的局限性和别人见解的价值的同时发现，能减少专家们的骄傲自大，提高学术工作中谦虚谨慎的作风。经过一番特殊的努力，集体研究还能对松散联合的研究中所出现的混乱现象提供一定程度的概念和分析方面的条理性，不是严密地控制研究，而是建议研究什么最有前途。这种集体研究，通过妥善的报道及不同专家的汇集，有助于博学之士了解各专业的特殊贡献，融会贯通，促进更为广泛深入的理解。

这些就是本书作者的希望和目的。本书主要的八章就是要阐明八个观点：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社会学的地位观点、文化的观点、科学的观点、以政策为中心的观点。我们要求专家们通过他们学科领域的透镜观察高等教育，说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各个观点注意高等教育系统的什么方面？什么是一个观点所想像或看到的，而其他观点所不会考虑或强调的？把高等教育看做一个政治系统、一个经济系统或者一个科学系统是什么意思呢？一个观点怎样和指导其他领域分析的研究方法联系起来呢？非历史学家的观点能千方百计解决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问题，还是他必须基本上保持与历史无关呢？有没有可以辨别的重叠部分或差距呢？

第一章至第八章这八篇文章开始是这样计划的：让八位学者各摆自己的观点，各取自己的方式。但是，他们也对一些共同的课题、邻近的解释、对别人有助益和使他们感到舒服的研究方法，寻求某种统一的认识。1982年，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的夏季学术讨论会上，<sup>①</sup> 经过四天的热烈讨论，25 位专家批判地评价了这 8 篇文章。这 25 位专家都凭学科专长和比较研究的经验选聘，以保证对有关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然后对每篇文章进行修改，编辑成书。

第一章至第八章主要不是理论的系统阐述，或者方法论的运用，也不是文献的评述。确切地说，我们要求每位作者突出各自学科领域中在广义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方面的长处，进而以较大篇幅说明已经掌握的材料。某一特定的研究方法对理解高等教育提供了什么优秀的学术成就？此外，每位作者可以任意发挥各自特有的分析兴趣和优势。高等教育的研究既是一个散开的研究领域，又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每一

“高等教育系统：八个学科的和比较的观点”讨论会，于 1982 年 7 月 26 日至 31 日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出席的 25 位专家除本书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和社会学教授伯顿·克拉克 (Burton R. Clark)、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哈罗德·珀金 (Harold J. Perkin) 教授、英国布鲁纳尔大学政治系主任莫里斯·柯根 (Maurice Kogan) 教授、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加雷斯·威廉斯 (Gareth Williams) 教授、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马丁·屈罗 (Martin A. Trow) 教授、英国苏萨克斯大学教育系主任托尼·比彻 (Tony Becher) 教授、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研究所西蒙·施瓦茨曼 (Simon Schwartzman) 教授和巴黎第九大学教育和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拉迪斯拉夫·塞里奇 (Ladislav Cerych) 博士 8 人外，尚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鲍德里奇 (J. Victor Baldrige) 博士、柯尔曼 (James S. Coleman) 教授、罗蒂斯 (Gary Rhoades) 博士和苏洛蒙 (Lewis Solomon) 教授，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罗斯布拉特 (Sheldon Rothblatt) 教授，耶鲁大学的盖格 (Roger Geiger) 博士，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阿尔特巴赫 (Philip Altbach) 教授，阿姆斯特特马斯萨诸塞大学的伯恩 (Barbara Burn) 博士，马里兰大学的伯达尔 (Robert Berdahl) 教授，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布莱克·斯通 (Black Stone) 教授，兰开斯特大学的富尔顿 (Oliver Fulton) 博士，巴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弗恩 (Dorotea Furth) 博士，西伯林自由大学的胡夫纳 (Klaus Huefner) 教授，卡塞尔综合大学的泰希勒 (Ulrich Teichler) 教授，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普雷姆福斯 (Rune Premfors) 博士和威特洛克 (Bjorn Witrock) 博士，以及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潮木守一教授。

个航行者在探索解释的道路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个课题是一个“软”课题。在这个领域中，个人的风格和解释将继续起重要作用。所以，本书八章的内容既表达八个学科的观点，也是八位专家的个人的意见。

八位作者是以其跨国经验受到邀请的。我们要求作者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搜集材料，尽可能充分地进行比较的分析。在探索若干高等教育系统的工作时，一个公认的观点最能从叙述所示的材料中表明它的价值。如果一个比较新的观点很少有研究可以加以引用，那么它就指出当进行更多的研究时可以明确什么问题。无论旧的或新的研究方法对教育制度这种客观现象，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寻求共同特征和经常发生的模式以及同时离析独特性的广泛运用的方法。高等教育的研究，需要利用最大可能范围内有关共同性和多样性的资料。所以，我们采用的所有观点对跨国研究都是有用的。同时，著名的专家们使用的知识只是逐步地扩展到各大洲。以下各章主要反映对发达的工业国家的高等教育的专门知识，它们只是稍微注意了一下发展中国家，并只是偶尔评论共产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

这八章合起来也是提高比较高等教育讨论的标准的一次努力。过去 20 年来，在系统地探索不同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的现实方面有过一些进展。但是这种分析，相对来说比较新，在各大学缺乏巩固的立足点。忙于其他事情的参加者所作的大量评论，远远超过这些分析研究。学者教授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孜孜不倦，严格要求，但往往没有充分准备讨论高等教育，很像忙忙碌碌的医生对医院组织和医学专业状况发表意见。有才能的行政工作者聚会讨论最近发生的问题，解决一

些特定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有个哲学家或政治家重申一下高等教育的理想就够了。总之，即使在早期阶段，也有许多观点和材料需要掌握。同时，还需要尽量把描述性、分析性的材料和规范性的材料区分开来。把‘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区分开来。

有必要对“系统”这个比较难懂的名词进行说明。系统这个名词有很多用法，意义变化不定，模棱两可，使人感到麻烦，但在任何社会科学中又必须采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在规模和复杂性很不相同的水平讲高等教育中的系统。例如，课堂的社会系统，大学作为一个系统，一个国家的所有中学后教育看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本书中“系统”的用法采用后一种意义，较小的实体就变成子系统。我们也可以正确变更包括在任何层次的行动者和行动，任意划分边界，规定界内界外。不同观点有不同的切割方法。经济的观点看到的是经济活动，其他活动就在“经济系统”之外。它把人看做经济的行动者，从事资源的分配或货物和服务的交换；当同样的一些人从事其他活动时，他们就在系统以外。甚至当我们集中在一个层次，从一个观点做工作时，在分析中常常要从“系统”的一种用法转变到另一种用法。所以，在用组织观点研究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时，开始时我们可以依靠传统的定义，指大学和学院的集合体和教育部这一类正式的协调工具。所有其他实体和集团都在系统以外，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但是，这就需要扩展边界，把认真从事教育活动的行动者和行动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如学校的董事、立法机关中管高等教育的各种委员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把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机构摆在系统以外。当外界的利益集团在各种有影响的管理

委员会担任一定的职务时，例如瑞典，它们显然已经转移到系统以内。因此 即使在一种分析方法以内，“系统”的松散和不同的用法也是可取的。

以下扼要地介绍一下这八个观点，提出一两个中心研究成果，也指出不同观点之间的若干联系。最后在结论一章中研究这八个观点所集中的四个主要问题，即政治经济学、机构和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管理政策上的涵义。

## 历史的观点

历史学家保证我们在探求时间维度，并且把相继的阶段看成是一个阶段通往另一个阶段。历史的研究也就是要提供种种比较 帮助理解当前 用过去大学的概念来阐明今天大学的概念；早先几个世纪大学的衰弱和复兴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大学的衰弱和明天大学复兴的可能性。关键的问题是在哪些方面 如果有的话 高等教育总是同样的东西 当变化发生时 它们是直线发展 前进到新的存在形式 还是常常回归旧的形式，重新发明历史的车轮呢？历史的叙述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历史成为与变革和稳定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不被人承认和未见到的事情。在这点上，历史学家允许自己享有特权，并常常集中注意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所发生的络绎不绝的事件，别人分别研究的许多因素都在这里汇集。历史学家提供比较全面的叙述 较少有经过选择的理论作指导 而别人则

有意识地强调某一方面或另一方面。

因而 哈罗德·珀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有四个重要阶段的总的看法。在第一阶段，一个独特的机构——西方大学——诞生。从最初的几个世纪产生的同行会一样的价值观念和结构，成为大学长期生存和适应的关键。在第二阶段，从 17 世纪中期到 18 世纪中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高等教育出现了长期衰落的现象，后来在取代牛津和剑桥等古大学的新院校开始了复兴。这些新的院校，如设置自然科学课程的学院、工人讲习所，以及从伦敦大学和达勒姆大学开始，在设置上不同于旧大学的一系列新大学。在第三阶段，我们亲眼目睹 19 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造”关键的方法是形成单学科教授，强调高度专门的研究，以研究为基础进行教学。德国的学术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全速发展，德国的大学制度在很长时期成为公认的国际模式。最后，在当前第四阶段，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法人的官僚机构，完全成为或者非常接近国家的一部分，一般地说 成为“近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历史的回顾表明 高等教育可以产生巨大的变革 也可以死气沉沉毫无活力。某些基本形式，比较显著的是类似行会性质的教授组织，其顽固性尤为突出。社会的这一部门开始就持有的自由与控制之间的紧张状态也很显著。在过去，这种紧张状态主要是大学教师反对官吏和政治上的统治者。现在，官僚主义的控制成为大学教师所要求的自由的更为严重的威胁，他们认为必须有这些自由才能有效地工作。国家对高等教育部门的权力越来越趋向制度化，变成官僚主义的形式。

## 政治的观点

莫里斯·柯根捡起历史学家对当代社会的国家权力的重视，扩充到近代高等教育比较属于政治方面的分析。他把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区别开来。微观政治主要指大学内部的政治，往上逐渐变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政治，而宏观政治则主要指国家级的政治，往下逐渐变为国家官员与大学和学院之间的关系。随着我们从一级转到另一级，我们常常需要不同的政治理论和方法。当我们从二分的关系沿着规模的大小往上转到世界系统的关系时，政治的问题会起质的变化，因此必须采用不同的概念。当我们处理大学和大学内部的工作时，我们必须了解学院的权力形式，并且把系科和学院描绘为对抗的利益集团。当我们直接转到国家级的高等教育政治的方向时，我们需要用正在出现的组合主义关系的思想武装起来，主要的外部利益集团，例如大劳方和大企业的有组织的成员，有系统地卷入高等教育的控制，并且利用政治科学家的能力分析政治党派、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公众事务部门。“政治”从顶端伸展到底层，从最外部有关的行动伸展到最内部持续的行为。

柯根通过考察英国新近发生的事情，先在下层，然后在上层，使这些概念有血有肉。英国大学在经营管理上还是明显地不如美国大学，在受政府影响方面不如瑞典大学。英国大学自治从来比较高，学院控制一直比较强。但是，中央政府收

缩高等教育系统的努力可能在内部政治组合方面引起变化。“学院模式”处境极度紧张，更多的“经营管理”似乎不可避免。英国在国家一级，上层人士参与很多决策一直是秘密的，因而工作作风基本上是反学术性质的，需要由政府官僚系统吸收一些学术寡头。最近由于国家迅猛地收缩高等教育系统，这种根深蒂固的趋势已进一步加强。

柯根在他写的那一章，提出很多可以用政治分析开采的行动富矿。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强烈政治性的综合体”。但是，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中政治学最不注意高等教育。它只是最近才开始注意这个显然有吸引力的研究课题，有众多的可供选择的和相互竞争的权力形式，外部和内部的利益集团以各种方式进行交易和交替换位。在不同的国家控制和政权形式之下，集团自由既提高又缩小。多元主义、联邦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控制、权力主义、组合主义——一般合法控制问题——可供进行探索，这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新领域是很有利的。柯根引用的参考文献，是一个良好开端，他特别引用许多青年学者的作品。今后十年，政治分析对我们理解高等教育应该作出更大的贡献。

## 经济的方法

经济学家比政治学家更关心高等教育的研究，并且已经掌握更多的理论和方法。人力资本概念曾经是经济学家对一般教育思想的主要贡献。正如加雷斯·威廉斯指出，人力资本

的概念是一个老概念 见于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重新陈述,已经支配着高等教育经济学达 20 个年头。教育是人力资源的生产性投资这个思想,无疑将继续成为明达的传统智慧的一部分。但是,随着经济学家和后来社会学家探索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的证据,分析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对立的解释和说明从乐观的到悲观的都有。一场辩论正激烈展开着,高等教育主要在于筛选个人,选择那些证明对以后就业有用的特性的人呢?还是通过有用的知识和技能的投资直接地影响人呢?

经济学家另外能给我们做些什么呢?明确地说,他们能把个人的行为转变为院校的行为,按威廉斯所设计的方法,转变为影响大学和学院、系科和研究所的财政模式和机制。“谁出资谁定调子”这句老话需要区别对待加以修正,因为决定调子怎么吹的是付钱的方法。各国政府可能很不相同的分配经费的方法,影响着高等学校和教授的行为。一个政府可能放开一笔钱,用一次总付的方法从上一级发放给下一级,从而促进学校和系科的自主权。另一个政府可能有一个切片分配协调一致的体制,在职务门类内部经费固定,如从文官级教授工资到打字员的预算,从而增加中央对整个系统的控制。大部分影响学者日常生活的中间的决策,由各种不同的行政安排处理。

威廉斯研究高等教育经费的方法是高度制度化的。他谈到英国目前高等教育经费制度的历史根源,继而进入近代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比较官僚机构和市场体制的做法和效果。他还讨论了利益集团和政治的作用。他的研究方法是如何拓宽经济,是与非经济的研究方法有效地互相作用的典范。同时,

他提出一个关于财政机制的中心性（centrality）和特殊性（specificity）的有力论据，经济学家有充分的准备研究这些现象。既然这些机制也是比较可以处理的，对这些机制工作的方式以及它们所产生的效果的分析，可以使学术接近制定教育政策的人们的利益。

## 组织的观点

组织分析是过去 25 年内爆发出来的，现在变成有着十分不同的着重点的许多方法的集合体。组织分析家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及企业和公共管理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他们的兴趣非常广泛，包括从最基础到最应用性的、从社会一级到领导的心理学。他们已经开始对历史的解释感兴趣，进入历史领域，试图决定早先的组织形式是怎样引起并制约后来的组织形式的。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关于组织的理论工作开始考虑高等教育的各种机构。研究大学和学院的分析家发展新的概念，或者修正和应用老的概念，这些概念都适合高等教育领域，如松散结合的系统、有组织的无秩序状态、学院权力、政治的或利益集团的模式。70 年代还出现了把组织分析应用到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包括直接的跨国性比较的趋势。

本书第四章着重讲跨国比较，具体提出三大类跨国比较：怎样在院校内部和院校之间划分工作；形形色色的信念怎样产生和维系；权力怎样分配。明白这些特点以后，我们就能够

依次观察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不断扩大的复杂性。高等教育系统复杂的内部组成中心是学科和事业单位的交叉使大学教师隶属于两种完全不同形式的组织，并把他们置于双重权力之下。很大的权威坐落在系科或工作层次在这里教师既代表他们的学科领域又为特定的高等院校工作。

围绕高教系统的特殊内部结构，各国高教系统各不相同，从高教系统内部的特殊结构产生了国家调整的很多特征。扩大的组织想像延伸到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概念，使我们把市场的联系形式和官僚的、政治的和少数人垄断的形式并列起来。学科和院校的基本矩阵也制约着改革和变化。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特别难于大规模地通过从上到下的命令变动却很可能出现很多基层群众的革新渐进地发生一些变化变化的方式常常难于从系统外部甚至系统内部辨别出来。

组织意识使观察者觉察到组织塑造结果的许多方法，包括对抗中的观念的命运。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只有一个部门还是有两个部门或者有六个部门各国高等院校或各国高教部门之间的分界线是密封的，还是允许学生从一校或一个部门转到另一校或另一个部门，允许教授从一校或一个部门流动到另一校或另一个部门有无研究生院工作层次是讲座还是系科或者寄宿制学院凡此种种都有影响。以上这些结构上的特征影响着对教学承担的义务、科研的能力、学生的入学机会、教师的士气、课程的重点等等。它们很可能影响一门门知识即科目的生存性还有在这一门门知识的基础上并围绕它们构成的高教系统。从最近来看，一个特殊的任务是对系或工作层次的研究在这个层次上学科专业的结构和文化与院校及广大高教部门会聚在一起。

## 社会学的观点——地位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家长时期来一直注意社会的分层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流动和不平等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个人的地位。在“地位成就”研究方面作出了大量贡献。在美国和英国更是如此。他们主要考察了教育结构和个人社会地位变化的关系。他们较多地注意了个人地位的变化，但很少注意院校的地位以及系统内较大单位的相对的社会地位和学术等级等现象。马丁·屈罗写的地位的分析一章正好转向这后一种非常需要客观分析的方式，转到比较高等教育工作者在“院校等级”的概念下应研究的许多现象。

一切高等教育系统都具有某种院校等级，在资源分配、吸引教师和学生方面，学校声望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等级在程度上和形式上有很大差别。屈罗比较德、法、英、美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部门结构表明了这一点。等级可能是十分高峰形的，或者是中等高峰形的，或者是相对平坦形的。它们明显地表现在一定时期内有很大的稳定性，但是也容易发生变化。像美国州立学院或英国大学这样巨大的部门中，各院校地位的差别在部门之间的差别正在减小时甚至会扩大。地位等级的性质基本上决定于政府，通过职能资源的分配，或者主要通过院校的相互影响，通过竞争。我们可以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国家控制是不是意味着把声望等级向下拉平，而市场的相互影响则导致向上拉平？如果不是，促进相反的结果的条件

是什么 怎样在‘大众化’的院校维持成绩优秀的‘飞地’呢？领导在大学和学院的地位成就中起什么作用呢？在很多国家 等级最高的院校都是最先创办的院校 历史的优先有多么重要呢？

集中注意院校的地位，也带来在维持大学和学院的优势以及推进多样化和适应性方面的广泛的公共政策的问题。丧失地位的原因似乎是院校不稳定和易受批评，因此在较大的劳动分工中寻找受到尊重的和有尊严的地位成为紧要的事情。创办综合大学 使一个正规的实体具有多种功能 可能导致一些单位成为多样化的系统的一部分，或者使它们成为替代品。地位在学术系统中发挥非常强大的作用，取代金钱作为基本的交换货币。事实上，一切重要的政策审议需要对它的用处 特别对它的重新分配非常敏感。

## 文化的观点

高等教育的文化观点是八种观点中最新的观点。在本书第六章 托尼·比彻直接吸收人类学分析文化的传统，把文化看做‘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的行为方式’。他也选择‘文化’这个概念的比较人文主义的用法——“文化塑造个人的心智”——并取其适当的学术文化的意义 从而把一个因古老而被视为神圣的名词的两种有力的和不同的用法融为一体。

大学教师靠他们工作系统所固有的许多亚文化过活：个

别学科的亚文化，特定的大学或学院的亚文化，一般学术专业的亚文化，甚至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亚文化。学生也发展他们的文化，学生和行政人员人数众多时通常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在主要的文化形式中，学科文化在近几年来明显地升高了。所以，比彻适时地集中论述学科文化，汲取他自己的开拓性的工作中的成果。他的论据是新颖的，是很有见识的。科学的社会学中占优势的思想认为，学术文化是社会决定的。比彻在这个概念中树立这样的论点，这就是不同领域中各自的知识群与学术文化有关系。特定的学科，首先就是埋置在特定的知识群之中。这种知识包含特定的理论、分析的方法、方法论和专门的技术。各种学科就是具有各自思维风格的思想群体。

比彻进一步阐明，每一门主要学科就是一组次级专门化，这些次级专门化成为他们成员的有一点儿不同的文化之家。比彻从他自己对生物学、工程、历史、法律、物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在次级专门化之中有穿过学科边界线的某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在一个层次，学科是文化分析的适当基础。在另一个比较专门的层次，学科不再是“这种分析的一个可行的框架 必须沿着不同的路线绘制边界”。

像对一般组织特征的研究一样，我们可以观察到研究工作者和观察者对学术生活的象征性方面变得更加敏感。虽然学术文化的研究似乎和政策管理相隔遥远，比彻指出，如果政治家和行政人员能从文化的研究，获得“对不同的学术生活及其教学和科研的职能比较深刻的认识”，政策常常能比现在更好地和高等教育的工作条件协调一致。